

第一章 资本五个神秘之处

关键问题是要查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好像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钟罩里？它为什么无法扩张并占据整个社会？……（为什么）资本形成的巨大速度只可能出现在某些社会部门，而没有出现在当时的整个市场经济中？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商业的发展》

在全球五分之四的人口看来，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成功时刻就是它的危机到来之时。

柏林墙的倒塌结束了东西方之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政治斗争。资本主义岿然耸立，成为合理组织现代经济的惟一可行方式。历史发展到这一时刻，有责任感的国家别无选择。结果造成，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①带着不同程度的热情平衡预算、削减补贴、引进外资并降低关税壁垒。它们的努力换来了痛苦的失望。从俄罗斯到委内瑞拉，过去的这五年间充满了可怕的经济灾难，国民收入急剧下降，到处都是

忧虑和怨恨；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尖锐的言词来说：“这是一个饱尝了冻馁、暴乱和掠夺的年代”。《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社论指出：“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地方而言，西方国家在冷战胜利的余辉中所颂扬的市场，已经被市场的残酷性、对资本主义的警惕性和不稳定现象的危险性所取代。”资本主义只在西方取得过成功，而事实上，它也许能够成为治疗经济和政治灾难的药方。

正享受着和平与繁荣的美国人很容易忽略地球上其他地方的动荡不安。道·琼斯平均指数比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爵士^②爬得还要高，资本主义又怎会处于困境呢？美国人发现，尽管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步履缓慢、蹒跚，但还是正在取得进步。你毕竟能在莫斯科吃到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包，能在上海租到好莱坞斥巨资拍摄的电影的录像带，能在加拉加斯^③接入互联网。

然而，即使美国也不大可能抑制住一种不祥的预感。美国人看到，哥伦比亚徘徊在贩毒武装和受压迫的民兵组织之间的游击战争的边缘；墨西哥南部接连爆发难以驾驭的暴乱；亚洲强行发展出来的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部分消耗在腐败和混乱状态之中。最不利的是，在前共产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制度一事无成，而旧政权时期的官僚即将重新掌权。有些美国人还感觉到，美国长达十年的经济繁荣的一个原因在于，世界其他地方越不稳定，美国的股票和债券对国际资金就越有吸引力。

西方商业社会的担心日益增长，害怕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没有成功地实现资本主义，最终会导致世界上的富裕经济陷入衰退。诚然，市场上新兴流动资金的减少已经使数百

万名投资者痛苦地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是双向的过程：如果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不能摆脱西方国家的影响，西方国家也不可能摆脱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影响。在富裕国家内部，资本主义的不良反应也一直在逐渐增强。日本正在艰难地度过自大萧条时期④以来最漫长的衰退。西欧民众投票拥护那些保证推行‘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是对一本题为《悲惨经济》的法国畅销书驳斥的观点）的政治家。

尽管这些微弱的示警声令人不安，然而到目前为止，也只不过是让美国和欧洲的领导人向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重复后者已听了很多遍的乏味说词：稳定你们的货币，努力坚持下去，不要理会粮农暴动，然后耐心地等待外国投资者克服他们的恐慌之后再回来投资。

目前，有外国投资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且外资越多越好。稳定的货币也是好事，自由贸易、透明的银行操作、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源自西方的每一种补救办法都是好事。我们渐渐忘记，拉美国家自 19 世纪 20 年代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以来，至少已经四次尝试进行旨在创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拉美国家的铁路由英国人经营，而公用设施则由大陆欧洲人管理）。每次都是在经过一番努力和体验过最初的欣喜之后，又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政策中抽身返回。因此，这些补救办法是不够的。事实上，这些补救办法远远不够，并且基本上与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里的实际问题毫不相干。

这些补救办法失败之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经常会作出回应。它们不是质疑这些补救办法恰当与否，而是责怪

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缺少企业家精神或者缺少市场定位。如果它们得到各种绝好的建议,而仍然未能繁荣兴盛起来,那就只能怪它们自己。也许是因为它们错过了新教改革,或者是被殖民主义欧洲无能的残余影响所削弱,或者是因为它们智商太低。不过,“‘文化’是解释资本主义在日本、瑞士和加利福尼亚这些各不相同的地方取得成功的原因,同样是‘文化’,又造成了中国、爱沙尼亚、下加利福尼亚^①这些依然各不相同的地方的相对贫困”——这种说法非常不近人情,而且无法令人信服。西方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财富差距太大,不能仅仅用文化上的理由来解释。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也渴望从资本中取得收益,移民们于是蜂拥进入西方国家,其中还包括桑切斯的孩子和赫鲁晓夫的儿子。

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城市里充满了企业家。你走过一个中东集市,旅行到一个拉美小镇,或者钻进莫斯科的一辆出租汽车里,都免不了要碰上什么人试图和你谈交易。这些国家的人民拥有智慧、热情和白手起家的惊人能力,能够掌握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否则,美国企业也不会这么费劲地控制其专利不会在国外被侵权使用,美国政府也不会这么迫切地努力不让现代化武器技术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手中。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对市场有充分的认识。市场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恰恰是因为人类发现了市场,耶稣基督才把钱商赶出了神庙)。

不,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并不是可怜的乞丐。他们没有无助地陷于陈旧过时的方式中,也不是出现了机能障碍的文化里缺少鉴别能力的囚徒。资本主义已经

为西方国家带来了财富，又是什么原因阻止它为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带来同样的财富呢？为什么资本主义像是被封闭在钟罩里，只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了呢？

我打算在这本书中阐明，阻碍全球五分之四的人口从资本主义中获利的主要绊脚石在于他们无法创造资本。资本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创造国家财富的动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线，是发展、前进的基础。无论贫困国家的人民多么热切地参与其他所有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特征的活动，他们都似乎不可能为自己创造出资本。

我和我的研究小组已经在亚洲、非洲、中东和拉美挨家挨户地搜集到大量事例和数据。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还要借助这些事例和数据来指出，大多数穷人已经拥有了成功地创造出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资产。即使是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里，穷人也有积蓄。实际上，穷人积蓄的价值巨大无比，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自 1945 年以来所接受的全部外援的 40 倍。例如在埃及，穷人所积累的财富相当于有记载的外国全部直接投资（包括苏伊士运河和阿斯旺大坝）总额的 55 倍。在拉美最穷的国家——海地，穷人的资产比海地自 1804 年从法国统治下独立之后所接受的所有外国投资大 150 多倍。如果美国最终同意把它的外援预算提高到联合国所建议的水平——即国民收入的 0.7%——这个地球上最富的国家也要用 150 多年，才能把与世界上较贫穷的人们已拥有的财富价值相当的资产交给他们。

但穷人掌握这些资产的方式有很大缺陷：房屋建造在没有恰当的所有权记录的土地上；公司没有法人地位，没有明确的责任；企业处于金融家和投资者的视野之外。由于人们对

财产的所有权没有恰当的文件证明，这些财产不能方便地转换成货币，不能在人们所处的互相了解和信任的狭隘地域范围之外进行交易，不能用作申请贷款的抵押品。

相比之下，在西方国家，每一块土地、每一幢建筑物、每一件设备、每一件存货都在所有权文件中得到表述。这些资产和经济的其他方面紧密相联；所有权文件成为这个庞大的潜在联系过程的可见标志。由于这一表述过程，资产就能产生出与它们的物质存在相平行的一种不可见的存在方式。资产能够用作贷款的抵押物，在美国，用于开办新企业的资金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抵押企业家的房屋。资产还能用作联系资产所有人的信用历史的纽带，用作偿还债务和纳税的记账地址，用作公共设施机构向资产所有人提供服务所需的可靠基础，用作发行有价证券（例如背书抵押债券）的基础——这些有价证券然后又能在二级市场上再贴现和销售。由于这一潜在的、不可见的联系过程，西方国家能够为资产注入活力，使之成为通用的资本。

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这类表述过程，因此大多“资本不足”——就像一家“资本不足的”公司，它所发行的有价证券少于它的收入和资产所决定的价值。穷人的企业和那些不能依靠发行股票或债券来获取新的投资和资金的公司非常相似。事实上，如果不能使资产在所有权文件中得到表述，资产就只能是“僵化的资本”。

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居民——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四——确实不是一无所有，但他们缺少表述所有权和创造资本的过程。他们有房屋，但没有所有权凭证；他们有产出，但没有契约；他们有企业，但没有法人地位。他

们能适应从回形针到核反应堆的每一个西方发明，但正是因为他们缺少这些基本的所有权表述，才始终无法创造出使他们的国内的资本主义制度发挥功效的足够资本。

我认为这就是资本的奥秘。要解开这个奥秘就必须弄明白：为什么西方人通过用所有权文件来表述资产，就能够从资产中发现并提取出资本。我们知道某些事物的存在（例如资本），但却看不到它们——理解并掌握这类事物一直是对人类思维的最大挑战之一。从柏拉图（Platon）到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哲学家们已经懂得：并非任何真实的、有价值的事物都是有形的、可见的。时间是真实的，但只有当它通过钟表或日历表现出来的时候，才能被有效地加以运用。综观历史，人类已经发明创造出一系列表述制度——文字、音符、会计复式记账法——来掌握人手所无法触及的事物。同样，资本主义的伟大实践者们——从创立综合所有权制度和公司股票奠基人到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通过设计出新的表述方法，用于体现深藏在我们所积累的资产里的无形的潜能，就能从资产中发现和提取资本，而其他人看见的只是一堆旧货。

正如此时此刻，在你的房间里，你被来自乌克兰、中国和巴西的电视信号所包围，但你看不见这些信号。同样，你也被无形之中暗藏着资本的资产所包围。乌克兰的电视信号很微弱，你无法直接察觉；但在电视机的帮助下，电视信号就能被解码，使你能够看到、听到。因此，资本也能从资产中抽取和加工出来。问题是，只有西方国家具备通过资产表述，大量地把不可见之物转化成可见之物所需的转换过程。我将在这本书里指出，正是这一不同之处说明了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创

造资本，而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却无能为力。

我还要指出，这些国家缺乏这一表述过程，并不是某些西方国家阴谋制造垄断的结果。应该说，西方人认为这套机制完全是天经地义的，对它的存在根本没有自觉的意识。尽管它非常庞大，但没人看得到。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的财富全赖于他们对这套机制的运用能力，但即便是他们也看不到。这套机制是藏在他们的所有权系统内部的固有法律基础——所有权仅仅是冰山一角。冰山的其余部分由复杂的人为过程构成，这个过程能够把资产和我们的工作成果转化为资本。因为它不是从模子里做出来的，也不是用虚有其表的小册子描绘出来的，所以它的起源模糊不清，但它的重大影响就深深地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潜意识之中。

如此重要的东西是如何进入我们的思维的呢？我们知道如何去做而不明白其原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早在成熟的磁理论发展出来之前，海员们就在利用磁铁进行导航，而早在门德尔阐明遗传学原理之前，动物育种者就已经掌握了足够的遗传学知识。西方国家的繁荣起源于充足的资本，但人们果真理解资本从何而来吗？不理解这一点，西方国家就总有可能破坏他们自身的力量来源。弄清资本的起源还会使西方人在面临繁华逝去、危机注定到来之时，做好准备保护自己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因为危机总是会来的。到了那时，总会在国际性危机中出现的问题又会被提出来：要花谁的钱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问题不能解决，谁要为之付出代价？

不过，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始终满足地认为，他们用于产生资本的系统完全是天经地义的，并且任由这一系统的历史模糊不清而不加论证。

这段历史必须挖掘出来。本书尝试重新发掘我们对资本的认知，并就此解释为什么说贫穷国家的经济失败和他们的文化遗产或基因遗传中的缺陷没有关系。有人提出过拉美国家和俄罗斯之间有“文化”共通性吗？然而，自它们都在最近十年里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开始建设资本主义之日起，它们也开始面临同样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显著的不平等、地下经济、黑手党泛滥、政局不稳、资本流失、公然蔑视法律。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问题并非起源于东正教的教堂，也不是出现在印加帝国^⑥崛起的道路上。

事实上，正如我将在这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并非只有前共产主义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才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甚至在美国也能遇到这些问题——至少在 1783 年的美国。当时，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总统抱怨说：“匪徒们……在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的情况下掠走并消耗掉了这个国家的财富。”他所说的“匪徒”指的就是那些占据着不归他们所有的土地的不合法居民和非法的小企业家。由于城镇之间、矿山之间的所有权法案不尽相同，在接下来的 100 年里，这些不合法居民和为权利而战的矿工们就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展开了斗争，令当局大伤脑筋。事实上，遍及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新州和新的领土上，执行所有权法案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不安和敌对情绪。1820 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曾怀疑律师们是否有能力平息纠纷，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情况注定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因为美国“不是一个古老的保守社会，而是一个法律范畴内的新国家”。

听起来耳熟吗？不合法居民、匪徒、公然蔑视法律……美国人和欧洲人一直在告诫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

“你们肯定会更像我们。”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确很像美国——至少像一个多世纪之前的美国。北美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他们曾经也属于第三世界国家。这也正是我在本书中要带你回顾从前那些日子的原因。那时，西方政治家面临着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所面临的同样的戏剧性挑战。开发美国西部的拓荒者资本不足，因为他们几乎并不拥有所定居的土地和所拥有商品的所有权文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黑市上购物；大笑不止的游客们把硬币扔在泰晤士河泥泞的河岸上，让英国的街头顽童们争抢；16 000名资本不足的小企业家被科尔伯特技术统治论者判处死刑——他们惟一的罪名就是违反法国工业法令制造和进口棉布。

西方国家的历史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今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已经成功地把穷人纳入它们的经济，但现在甚至已经忘却了当时的做法，也忘记了使它们如此富裕的资本是如何开始创造的。正如最著名的研究美国革命史的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所写：“社会和文化中正在发生重大的事情，把普通人的热情和动力释放出来。这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⑦当时，美国人和欧洲人正准备建立广泛的正式所有权法案以及法案中使他们得以创造资本的潜在转换过程。

我要在本书中表明，西方国家正是在这一历史时刻跨过分界点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再是一个私人俱乐部，而变成了一种流行文化。乔治·华盛顿所担心害怕的匪徒变成了今天的美国文化所爱戴和尊敬的先驱。

* * *

这一充满矛盾的现象非常明显,同时也很令人不安。西方经济进步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资本——竟然最不引人注目。人们的疏忽使它看起来神秘莫测;事实上,资本共有五个神秘之处。

● 遗漏资料的神秘之处

慈善组织非常强调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穷人的痛苦和无助,但没人准确地记录下他们积累资产的能力。在过去的五年里,我曾经和来自六个不同国家的 100 名同事合上书本,睁大眼睛——然后走进四大洲的街道和农村,去清点僵化的资本。

● 资本的神秘之处

资本是货币潜在的根源,但我们已经忘记了‘资本’的最初含义。马克思(Karl Marx)说过,你必须超越物理学的界限,去接触那只‘下金蛋的母鸡’。亚当·斯密认为,你必须‘从虚无中创造出一条’抵达那只母鸡的‘道路’。资本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你如何才能抓住下金蛋的母鸡是我在这个章节中打算破解的神秘之处。

● 政治意识的神秘之处

如果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僵化资本握在这么多的穷人手里,政府究竟为何没有开发出这批潜在的财富呢?原因在于,随着全世界几十亿人口从小规模组织的生活跃入大规模组织的生活,他们所需要的证明在过去的 40 年里才变成现实。人口向城市迁移,使劳动力迅速分工,在较穷的国家里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工业/商业革命——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场革命基

本上被完全忽视了。本书试图将其再现出来。

● 历史意识的神秘之处

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里正在发生的情况，曾经也出现在欧洲和北美。不幸的是，我们被现代科技和众多国家在向资本主义的转换过程中的失败所催眠，已经忘记了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几年来，从阿拉斯加到东京，我访问过发达国家的商人和政治家，但无人能给出答案。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谜。最后，我在他们的历史书里找到了答案。

● 法律不健全的神秘之处

自 19 世纪以来，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一直在照抄西方的法律，为它们的人民提供创造财富的结构框架。它们今天还在照抄这样的法律，但显然并没有奏效。大多数人仍然无法运用法律把储蓄转化成资本。其原因和使法律生效的因素都还是未解之谜——这也是本书打算破解的神秘之处之一。

每一个神秘之处中谜都将成为本书中一个章节的主题。

* * *

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美国、欧洲和日本——取得了非凡成就，而在别处却基本上停滞不前？解答这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随着所有看似合理的、能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选择都已无影无踪，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也不再是用于冷战的武器，我们终于能够平心静气地仔细研究资本。这本书是一个尝试，是基于我在全世界的考察基础之上，从那些已

完成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国家的成功经验中提取出来的。我试图把所有这些情况都综合写入本书。

注释：

①本书作者所称“前共产主义国家”特指十月革命胜利后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某些自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这些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用高度集中统一的自上而下的计划取代市场对资源的配置。随着苏联的解体，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实行市场化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这种市场化改革使某些国家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中国)，但也使一些国家陷入困境，引发了诸多社会、经济矛盾(如东欧、俄国等独联体国家)。作者在本书中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现象、特别是问题的描述，有些并非由制度产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如腐败)，但计划经济的弊端确实存在。因此，作者在本书中竭力倡导的产权制度改革有可借鉴之处。中国自 1978 年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改革并没有改掉社会主义性质，中国是目前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体现。——编辑注

②埃德蒙·希拉里爵士 新西兰登山运动家，曾于 1953 年 5 月登上珠穆朗玛峰。——译者注

③加拉加斯：南美国家委内瑞拉的首都。——译者注

④大萧条时期：指 1929 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的世界性严重经济萧条。——译者注

⑤下加利福尼亚：即加利福尼亚半岛，是墨西哥北部的一个半岛。——译者注

⑥ 印加帝国 印加人是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曾经自公元 13 世纪开始，在南美大陆上建立起横跨厄瓜多尔和智利的幅员辽阔的帝国，文明高度发达。——译者注

⑦ 戈登·伍德，《创造美国的资本主义》，载《纽约书评》(1994 年 6 月 9 日)，第 49 页。

第二章 遗漏的资料

人类迷失在知识的信息海洋之中

——T·S·埃利奥特,《摇滚乐的合唱》

试想有这样一个国家——无人能确认谁拥有什么事物；住址不能轻易地得到核实；人们欠债不还；资源无法方便地转化成货币；所有权无法分割成股份；对资产的描述没有一定的标准，而且不能轻松地进行比较；邻里之间、甚至街区之间管理财产的标准都有所不同。想到这些，你就已经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前共产主义国家中了。更准确地说，你已经想像出了那些国家中 80% 的人口的生活。正如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把白人和黑人分开一样，他们和那些已经西方化的特权人士具有显著的区别。

和西方人经常想像的不一样，这 80% 的人口的命运并非彻底绝望无助。事实上，尽管这些人表面上很贫困，而且恰好生活在最不平等的政治制度中，他们所拥有的资产却多得让任何人都无法理解。不过，他们的资产却没有得到表述，无法产生附加值。当你迈步走出尼罗河希尔顿大酒店的门口，你

身后不是一个充满传真机、制冰机、电视机和抗生素的高科技世界；但是，开罗人，包括许多在你看来相当贫穷的人全都拥有这些物品。

在你身后的世界里，财产所有权可以合法地进行交易——借助于你的努力和资产，其中各种制度会使你获得第三方的利益。那些甚至连抵押物和能产生附加值的记账地址都没有的开罗人可能会富有得让你大吃一惊。在开罗城外，一些最贫穷的人生活在被称为“死城”的古墓区。但事实上，差不多全部开罗人如同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里的几乎所有人一样，都生活在一个死城之中——僵化的资本之城。在这里，资产无法像在发达国家那样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要理解这一点，你需要再次运用你的想像力。这次，你要让你的思绪回到 200 多年以前，回到美利坚合众国从蛮荒之中创造出一个社会的年代。美国不仅从英国继承了极为复杂的土地法案，而且还继承了一个庞大的、相互重叠的土地转让体制。同一英亩土地可能是英国王室转让给某人的一大片土地中的一块，而另一个人声称这块地是他从一个印第安部落手里买来的，第三个人则是用奴隶从州议会换得这块土地——但这三个人中也许没人真的亲眼看到过这块土地。与此同时，这个国家到处都是移民。他们不等政府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利，早早地就在边界线上定居、耕田、修建房屋、转让土地、建立信用。这就是属于拓荒者和“野蛮西部”的年代。称之为“野蛮”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些移民（大多数只不过是非法居民）坚持认为，是他们的劳动，而不是什么正式的书面所有权文件或随意划定的边界线，才为土地带来了价值并建立起了固定的所有权^①。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占有了土地

并且修建起房屋和农场,使土地得以增值,这块土地就应该属于他们。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不这么认为,官员们派军队来烧掉农场、摧毁建筑物,移民们予以还击。但是,当士兵们离开之后,移民们又重建家园,继续勉强维持他们的生活。

美国历史上的这种情况就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现实状况。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非常成功地把穷人纳入了他们的经济体制,但他们现在已经忘记了当时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也忘记了使他们如此富裕的资本是如何开始创造出来的——那时,巴黎和格拉斯哥就像今天的利马和雅加达一样,充满了茅屋和村舍工业;儿童们在成堆的垃圾上玩耍。乔治·华盛顿则抱怨‘匪徒们’侵入了他的农庄,并在那里不合法定居。

在 1950 年以前,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农业社会,会让 18 世纪的欧洲人觉得像回到家里一样。大多数人从事土地耕种,而土地则归极少数大地主所有。这些地主有的属于土生土长的寡头政权阶层,其余的则是殖民种植园园主。城市很小,都是作为市场中心存在,而不是工业中心。占据着城市的是少数商业特权人士,他们用厚厚的规定和章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突如其来的革命

1950 年之后,第三世界爆发了一场经济革命。这场革命类似于 1800 年欧洲的社会和经济崩溃。新机器的应用减少了对农村劳动力的需要,新型药品和公共健康措施降低了婴幼儿的死亡率并延长了人的寿命。很快,成百上千的人沿着新建成的高速公路,来到被新的广播节目描绘得充满了诱惑

力的城市。

城市人口开始急速上升。仅仅在中国，自从 1979 年以来，已经有 1 亿多人从乡村迁移到城市。从 1950 年到 1988 年，大城市太子港^②的人口从 14 万增加到了 155 万；到 1998 年为止，城市人口数字正在接近 200 万。这些人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二居住在城市贫民窟里。早在 1973 年，在人口拥入城市的最高峰到来之前，专家们就已经对城市中新定居人口的高涨深感绝望。一位城市规划专家写道：“城市似乎正在解体。不知为何，城市里到处都是不加控制的建筑，下水道无法排出雨水，每天都发生堵塞。人口集中的地区根本没有基础卫生设施……德萨利恩^③大街的人行道完全被小商贩占据……这个城市已经变得无法居住。”^④

几乎没人曾预料到这场人们生活和工作方式上的重大转变。时下，关于‘发展’的流行理论试图把现代化引入农村，认为农民们根本不应该到城市里来寻找 20 世纪。但不管怎样，成百万上千万的人还是不断进入城市。这些新来乍到的移民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敌意对抗，还撞上了无法渗透的法律之墙，阻止他们合法地开展社会和经济活动。他们很难得到住房，很难进入正规的商业领域或找到一份合法的工作。

对取得合法地位的阻碍

为了从城市新移民的角度了解生活的艰难状况，我和我的研究小组在大多数新移民定居的利马郊区开办了一家小型服装加工作坊。我们的目标是创立一家完全合法的新企业。研究小组的人员开始填写表格、排队、坐公共汽车到利马市中心，领取根据法律文书规定在秘鲁经营一家小企业所需的全